莱斯大学的围墙

□吴华伟

在美国访学期间,笔者所在的莱斯大学位于美国西南部经济中心休斯敦,其占地面积约265英亩(大约1100亩),在2013-2014学年,学校全部本科生加上研究生只有6628人,与国内动辄学生几万的大学比起来,可谓一个“袖珍型”私立学校。

该校规模虽小,但学术声誉很高,在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第17位,也被很多人称为“南方哈佛”。

莱斯大学建于1912年,由当时得克萨斯州的棉花富商William Marsh Rice捐资建立,一开始名为莱斯学院,1960年改名为莱斯大学。这里景色优美,校园里种满了橡树,草坪遍布学校各处,小松鼠们早已熟悉了学校的环境,无拘无束地在校园里跑来跑去、追逐打闹。而其中地中海式风格的建筑在全美大学中也很有特点,自然吸引了众多游人,甚至常见到有新人来此拍婚纱照。然而,跟多数美国大学一样,这里却没有围墙。

当然,没有围墙并不意味着学校没有门。事实上,整个莱斯校园一共有大大小小27个门(出口),其中有些门是开放的,有些门是在特殊情况下疏散人群备用的。不管哪一个门(出口),只要当时是开放的,一般都没有安保人员检查证件。要知道,美国人力资源费用很高,警察都不够用,估计校方也就舍不得在门口设置安保人员了。

一条沙土路围绕整个校园,路一边是校园的草坪、树木,另一边则是城市道路。这条宽两到三米、周长约6公里的沙土路,一方面起到了边界的作用,把校园与城市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无意中成了莱斯师生及附近居民重要的健身场所。每天从天蒙蒙亮一直到晚上太阳落山,这条路上总是人影不断,除了莱斯的师生,经常来这条跑道健身跑步的还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甚至有刚生完孩子就推着婴儿车出来瘦身的年轻辣妈。到了周末更是熙熙攘攘,其“盛况”一点儿不亚于国内大妈跳广场舞的场景。

在这条路上慢跑一圈需用时40分钟到1个小时,由于休斯敦夏季天气炎热,校方为跑步者考虑得很周到,特意安装了两个直饮水龙头。有意思的是,由于有很多人边跑步边遛狗,为了给狗狗解渴,每一个饮水点下面还设有几个狗狗专用的饮水碗。

跨过这跑道,任何人都可以进到莱斯大学校园内。如果把车停在外边,步行进入,你就可以自由游览。如果你开车进入,那一定要注意,要找到专门对来访者开放的停车场,如果随便在校园道路上停车,就有可能被贴罚单。如果是团体参观游览,组织者可以与莱斯校方取得联系,提前预约好来访时间,校方会为参观者提供免费的志愿者导游。

在校园里,游客可以随意漫步,沿途欣赏漂亮的地中海式建筑,跟不时跑到跟前的小松鼠打招呼。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那么也有一个好去处,可以到拥有约350万册图书的莱斯大学图书馆参观。尽管这是私立大学,但校外人士只要拿着有效的身份证件,便可进入其中参观和阅读书籍。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莱斯大学有一个三层体育馆和游泳池,还有一个标准的橄榄球场地。在体育馆内,有各种各样的健身设施和球类场地。场地是收费的,本校学生可以办不限次数的健身年卡,仅需300多美元,对本校老师和职员的价格则要翻番。校外人士也可以来此健身,只是不可以办卡,每次的进场费是5美元,也不过是一个汉堡或者两杯咖啡的钱。一般来说,莱斯大学附近社区大都有健全的健身机构,所以,很少有外人到此“蹭”场馆用。

当然,也有人担心学校的安全问题,本来休斯敦的治安就不好,学校没有围墙,也不检查相关证件,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其实,这大可不必担心。一方面,莱斯大学紧挨着休斯敦医学中心,其周围都是高档住宅小区,这些地方警力充足,安全工作做得很好。

总的来说,像美国其他高校一样,没有围墙的莱斯还是很开放的。对于莱斯这样的私立学校来说,与本地社区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很有必要。100多年前,富商莱斯先生捐建这所大学时,就已经表明这所学校是作为礼物送给休斯敦这座城市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莱斯大学从诞生开始就不能把自己与社区隔离开来。同时,作为私立学校,其经费来源除了学生的学费,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捐款,截止到2014年7月30日,莱斯捐赠基金总额大约有55.3亿美元。如果不能跟社区处理好关系,其社会声誉将会受到质疑,也不利于学校的筹款工作。因此,敞开大门,与社区积极互动,也就成了莱斯大学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作者为齐鲁晚报国际新闻部编辑、美国莱斯大学访问学者)

名家言

他们也是“富二代”

□刘天放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以前的“富二代”与当下的“富二代”没啥两样,无非是些坐享其成或胸无大志之类。不过细读一些史料,才感觉过去的“富二代”中还真有不少抱负远大之人,如清末民初的一些“富二代”,他们视金钱如粪土,不少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或投身革命,或去追求崇高的理想。记忆中,彭湃、殷夫、赵一曼、毛泽东、周恩来、吴焕先、刘格平、向警予、艾青、罗广斌、林觉民、叶剑英等等,都是富裕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但他们最终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或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革命先驱彭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人出身工商地主家庭,却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被家人骂为“逆子”。他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亲兄弟们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在那样一个昏暗的年代,彭湃就有如此气魄和胸怀,难怪日后他成为农民的杰出领袖,即使被捕后也依旧怀着这样的信念慷慨赴死。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同样令人震撼,黄花岗烈士中多是“富二代”。那么多“富二代”都投身革命,一方面证明清朝统治已丧失人心,另一方面说明这些年轻“富二代”的远见卓识,还可窥见有追求的“富二代”在当时绝非凤毛麟角。他们飞蛾扑火般的决绝、选择革命和敢于赴死的勇气,就是当时黑暗中国的火种。回望辛亥,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强邻虎视,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凡有志之士,无不主张推翻专制腐败的政权,革除暴政,通过民主共和拯救中国。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及海外留学生在黄兴的带领下强取两广总督署,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革命失败。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冒险收殓烈士遗骸72具,并将其葬于广州东郊的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死难者,数倍于此)。据史料载,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其中9人是留日学生。这些19世纪的年轻海归,均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为民族的自由和复兴,放弃锦衣玉食,割舍万丈柔情,用自己的生命去敲响苦难深重、满目疮痍的中国之黎明钟声!

黄花岗烈士中的留日学生林觉民当年才24岁,他以“亡大清者,必此辈也”的气魄,气宇轩昂地以死报国。还有年仅25岁的“富二代”海归方声洞,他起义前留言给父亲和妻子:“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还有曾谋刺摄政王、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的“炸弹大王”、年仅24岁的喻培伦……

“富二代”大体分两类,一类子承父业、兴家富族,或坐享其成,或庸碌一生,人生如行尸走肉者也不稀奇;另一类不甘寂寞和沉沦,以信仰和理想为导向,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然,不能强求“富二代”都先知先觉,或都那么高尚,但无论什么年代,有崇高理想和追求之人更能活出人的尊严和精彩。而庸碌无为的有钱人,不管他们是富几代,都无法与有理想和信念的富几代相媲美。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有一句话很流行:“先辈们出国带回的是救国良药,而今人出国带回的是彩电和冰箱。”到了21世纪,无论出国之人带回的是“洋奶粉”还是“马桶盖”,似都无可厚非,重要的是要有点家国情怀,有一点崇高的追求,别总想着自己的那点私利。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可民族复兴的大业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些“富二代”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内争自由,外求独立,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一代青年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成为他们自愿选择的人生归宿。他们这样做,自然少不了他们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不时仰望他们,不仅让当下之人总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个“小”,还可以时刻警示我们,一定要学会区分善恶,千万不要忘记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而什么又是不应该做的,哪怕自己再富有。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碎碎念

什么样的人有发言权

□董庆利

当然,学术死磕派会认为这是伪命题。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换句话说,人人都有发言权。这里我不想涉及一些敏感词,只想说说在当前信息传播迅速的年代,有时流言和谣言满天飞,“有关部门”和”明星专家”的话语也被批驳、误解或者嗤之以鼻时,什么样的人发出的声音才有更高的可信度或者影响力。

一般来说,当某种资讯为公众所关注时,如果定义为流言或谣言,为了防止以讹传讹,在相关领域里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是最有发言权的,比如转基因安全,比如大气污染,比如地震预测。然而当今的学科门类愈加精细化,每个人包括每个专家都不可能做到“老百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常说隔行的教授也不过是高中水平,因为你懂卫星上天不一定懂得田间管理,你懂汽车原理不一定懂电商运营。

求道于对应的领域内专家,相对于公知、媒体、官员是更靠谱的,然而,无奈的是,除非记者上网搜到专业研究论文,钻进实验室找到这些研究论文作者,“逼迫”他们作为业界行家发声解读或辟谣,否则,教授们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论文除了同行评议,还是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

再者,同一学科门类的研究方向也是更加精细化,隔行更如隔山。我常被朋友问及:你不是食品专业教授吗,怎么不知道吃什么好呢?我无法对自己研究方向以外的食品安全信息进行鉴别,只对一种食品、一种工艺甚至一种细菌、一种操作熟悉,术业有专攻,我除了对自己在研的课题相对自信、稍敢于发声评论外,其余的都只能模仿官方式回答“无可奉告”。

然而,当媒体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能够迅速找到最适合的专家教授去求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时候媒体找到的貌似专业的教授、研究员——他们虽以频出镜、频发声、粉丝甚众而走红——其实在业界并非学术大牛,也许他们依靠的还是好口才、好文采或者强大的某百科。

再次,有发言权的专家因为怕拍砖,怕记者和主持人曲解,怕发表科研界尚无定论的观点,甚至怕被某些打假斗士盯上,宁肯选择息声,宁肯回到实验室管好自己科研的一亩两分地更安全,本来,吃苦耐劳、甘愿坐冷板凳就是科学家的基本素养嘛。于是,又坐实了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专家不发声而显得自恃清高、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最近网上热议的复旦教授与某知名前主持人辩论,视频中这位教授怯生生地说出一个自己并不是很有把握的转基因问题的答案时,值得大大地点赞!其实这才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真实状态:严谨、务实、负责,或许再加上一点不善言辞和较真。当媒体、公众甚至大学生为某些化身正义和责任代言人的非科学家欢呼时,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明星光环和诡辩擅长者的趋同,是对真正献身科研的专家教授们的藐视和无知。

并无真正发言权的人引导了公众认知趋向,有专业背景发言权的人反而无言地沉默,是造成很多流言和谣言盛行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我们尊重每个公知、民科(民间科学家)、网络大V、网民发出声音,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话语权并不一定代表着权威和公正,点击量也不一定代表着可靠和正确,没有高大上更无永远伟光正,更多时候有对应研究方向的主流科学家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更高些,只是,各位“砖家看客”少些拍砖和喝倒彩可否?

(本文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